

批判資料

党内“左”右傾机会主义謬論摘編

广东师院政史系中共党史教研組

一九七四年一月

毛主席語錄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綫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

历史告訴我們，正确的政治的和軍事的路綫，不是自然地平安地产生和發展起來的，而是从斗争中产生和發展起來的。一方面，它要同“左”傾机会主义作斗争，另一方面，它又要同右傾机会主义作斗争。不同这些危害革命和革命战争的有害的傾向作斗争，并且彻底地克服它们，正确路线的建設和革命战争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毛主席語錄

革命的政党，革命的人民，总是要反复地经受正反两个方面的教育，經過比較和对照，才能够鍛炼得成熟起来，才有贏得胜利的保証。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有正面教員，这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也还有反面教員，这就是蔣介石、日本帝国主义者、美帝国主义者和我們党内犯“左”傾或右傾机会主义路綫錯誤的人。如果只有正面教員而沒有反面教員，中国革命是不会取得胜利的。輕視反面教員的作用，就不是一个徹底的辯证唯物主义者。

目 录

一、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謬論·····	1
二、陈独秀取消主义謬論·····	12
三、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謬論·····	18
四、李立三“左”倾机会主义謬論·····	27
五、罗章龙右倾分裂主义謬論·····	36
六、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謬論·····	39
七、张国焘反动謬論·····	60
八、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謬論·····	63
九、刘少奇“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投降主义謬論·····	78
十、刘少奇关于土改、整党的形“左”实右的謬論·····	85
十一、刘少奇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謬論·····	93

党的創立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1921——1927)

陈独秀右傾机会主义謬論摘編

(一) 誣蔑中国无产阶级不是“独立的革命势力”，不能成为领导阶级

工人阶级在国民革命中固然是重要分子，然亦只是重要分子而不是独立的革命势力。概括說起来，是因为殖民地半殖民地产业还未发达，連资产阶级都很幼稚，工人阶级在客观上更是幼稚了。詳細說起来，产业幼稚的中国，工人阶级不但在数量上是很幼稚，而且在质量上也很幼稚；此时中国工人阶级的理想，略分三类，第一，大多数还沉睡在宗法社会里，家族亲属地方观念还非常之重，这是因为不但多数手工业工人仍然在独立生产者的环境，有許多目前虽是近代产业工人，而他过去未来的生活，并未能与独立生产者（小手艺小商人小农等）的环境絕緣，不感政治的需要，并不脫神权帝王之迷信，产业之发达又多未成全国化，所以工人阶级的运动，犹多是支节另碎的地方的經濟运动而非国家的政治运动，工人阶级的理想，犹是宗法社会的而非国家的，这也是当然的現象。第二，只少数有了国家的觉悟，有了政治的要求，这种觉悟，这种要求，只在最进步的海員及铁路工人

罢工中才表现出来，其余多数罢工都不出日常生活的经济斗争。第三，真有阶级觉悟并且感觉着有组织自己阶级政党的工人，更是少数中的极少数；这极少数纯粹无产阶级分子，固然是将来无产阶级革命的唯一种子，即在各阶级合作的国民革命运动中，也是最勇敢的先鋒队，这是拿今年京汉路罢工事件可以证明的，这极少数最有觉悟的工人，在质量上虽然很好，在数量上实在太少，其余的工人更是质量上数量上都还幼稚，所以不能成为一个独立的革命势力。

因此，我们可以知道：中国最大多数的工人，还没有自己阶级的政治斗争之需要与可能，而且连一般的政治斗争之需要甚至于连自己阶级的经济斗争之需要都不曾感觉的工人（如手工业工人），也并不是少数。

《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1923年12月1日

（二）诬蔑农民“散漫”、“保守”，“难以加入革命”，竭力反对革命的农民运动

农民居处散漫势力不易集中，文化低生活欲望简单易于趋向保守，中国土地广大易于迁徙被难苟安，这三种环境是造成农民难以加入革命运动的原因。

《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1923年12月1日

有些自耕农居多数而且是小农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如中国），农民所受地主的压迫，不象地主强大的国家（如旧俄罗斯、印度）或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如欧美各国）那样利害，不容易发生社会革命的运动。

《中国农民问题》，1923年7月1日

我們此时农民运动的口号是：“全体农民起来反抗貪官污吏劣紳土豪，反抗軍閥政府的苛稅勒捐”。因此，現在农民协会的組織，尚不能帶有階級色彩（如单提出雇农組織或佃农的組織），不能明确的指出有若干亩田地者不能加入（因为不易定出一个适当标准），……。

……

对旧农会政策，农民协会会员，一面須尽可能取得旧农会，以免劣紳土豪利用旧农会——所謂合法机关——压迫农民。当地主与貧农有冲突时，应設法使旧农会居調停地位。

《第三次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議决議案》，
1926年9月

农民运动在各地均发生左傾的毛病，或提出口号过高，或行动过左，往往敌人尚未打着而自己受很大損失。

同上

素无組織訓練的农民，在有了武装之后，很易发生超出客觀限度以外的行动，甚至于为軍閥或首領所利用。

同上

民团固然是地主土豪劣紳利用以压榨平民，拥护他們自身利益的一架机器，但現時就望要根本消灭这种組織是不可能的。我們的政策是……以正紳代替劣紳为团总，使民团的权力第一步移到开明的小資产階級手上，而不为农民运动之障碍。

同上

在过去，我們的党只是帮助农民运动，現在，我們却必須

沒收大地主、中等地主的土地了。不过对于小地主是不能动手沒收的。在国民革命中，我們是需要小資產階級的。小地主也是小資產階級，因此我們对待他們，必須給以相当的让步。……

虽然我感觉到过去我們在这个問題上的策略太右了，可是无论如何，在目前沒收一切地主的土地，也是太革命了的。我們在相当时期以內，必須保持一种折衷的中庸的路綫，或許是很短时期的，然而在最近将来一两个月中，我們必須和小資產階級保持联盟。农村的階級斗争虽然正在发展，然而这个斗争还没有达到极端的程度，因此小地主是不能被剝夺的。我們目前是进攻大地主和中等地主呢，还是扩大农民运动的和軍事影响的范围呢？这个問題的实质是：我們目前加深农民革命呢，还是等待北伐的进展，等待农民运动扩大以后，再来加深农民革命呢？我以为后面一个意見，比較可靠些，因为旧的軍閥还是存在，而所謂新的軍閥（如蔣介石）也还没有打倒。加深基础，只有在基础扩大和巩固以后才有可能。

《中央政治和組織的报告》，1927年5月

湖南初期的农民运动，缺少党的指导，遂不免有些原始的幼稚行动（所謂幼稚行动在任何国家革命的初期高潮中都不能免），如捕人，罰款，阻禁，企图均分土地，同时举行宗教革命（毀庙毀祖宗牌位）道德革命（妇女解放）等，以引起一般社会之惊恐，土豪劣紳复捏造許多事实在軍隊中宣传，反对土地改革及根本反对民众运动之右傾分子更从而张皇其詞，使湖南出身的軍官咸抱不安，对湖南农民运动多少都表

示不滿，这些都是不可否認的事实。

长沙五月二十一日事变，自然和湖南农民运动的幼稚行动不无关系，……。

《湖南政变与討蔣》，1927年6月22日

（三）吹捧資產階級的力量“比农民集中，比工人雄厚”，主张一切联合、否認斗争，实行投降主义

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各社会阶级固然一体幼稚，然而資產階級的力量究竟比农民集中，比工人雄厚，因此国民运动若輕視了資產階級，是一个很大的錯誤觀念。

《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1923年12月1日

半殖民地的中国社会状况既然需要一个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在这革命运动中，革命党便須取得資產階級充分的援助，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若失了資產階級的援助，在革命事业中便沒有阶级的意义和社会的基础，沒有阶级意义和社会基础的革命，在革命运动中虽有一二伟大的人物主持，其結果只能造成这一二伟大人物的奇迹，必不能使社会組織变更，必沒有一个阶级代替他一个阶级的力量，即或能够打倒現在統治阶级（北洋軍閥），而沒有真实力量牢固的站住他的地位，被打倒的阶级时时都有恢复故物之可能。因此，我們以为中国国民党應該明白覺悟負了中国历史上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使命，……。

《資產階級的革命与革命的資產階級》，1923年4月

中国国民党目前的使命及进行的正軌應該是：統率革命

的資產階級，聯合革命的無產階級，實現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

同上

凡屬民主革命的分子，若當真要革命，便應該集合在民主革命的中國國民黨，使它成為一個強有力的革命黨，才有打倒軍閥的希望。若是大家都想到別樹一幟，這便是遊戲，出風頭，不是真要革命，如此做法，只有使革命勢力分散不能集中，只有使北洋軍閥延長生命。

《怎樣打倒軍閥》，1923年4月18日

事實上從建立黃埔軍校一直到三月二十日都找不出蔣有一件反革命的行動，如此而欲倒蔣，且正當英日吳張反動勢力大聯合，攻破北方國民軍之時，復在廣州陰謀倒蔣，這是何等助長反動勢力，這是何等反革命！介石先生，如果中國共產黨是這樣一個反革命的黨，你就應該起來打倒它，為世界革命去掉一個反革命的團體，如果是共產黨同志中那一個人有這樣反革命的陰謀，你就應該槍斃他，絲毫用不着客氣。

《陳獨秀給蔣介石的一封信》，1926年6月4日

資產階級，在民族民主的革命運動中，乃站在非常重要的地位，依現時世界政治環境，中國的國民革命若沒有資產階級有力的參加，必陷於異常困難或至於危險。……在事實上，自“五卅”以來，中國的資產階級已漸漸成了民族運動中之重要成份，具有領導此運動之傾向，特別是上海，加之軍閥內部分化之結果，新生的軍事勢力，在他們的思想上行

动上，无一不表现是民族资产阶级的武装之形成，这是我们所万不应忽视之中国民族运动中新发生的现象。

《第三次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决议案》，
1926年9月

国民党是中国革命运动之主要动力，断送了国民党的政治生命，便是中国革命运动之重大的打击。

《国民党内纠纷与中国革命》，1927年3月6日

国民党领袖将驱逐共产党，将压迫工会与工人纠察队。这类谣言，不审自何而起。……我们应该站在革命观点上，立即抛弃相互间的怀疑，不听信任何谣言，互相尊敬，事事商协，开诚进行，政见即不尽同，根本必须一致。

《汪精卫、陈独秀联合宣言》，1927年4月5日

（四）中国国民党既然是反帝国主义之工农及小资产阶级所联盟的党，当然处于国民革命的领导地位。

（五）国民党中的共产党分子，虽然参加政府（中央及地方）工作，而只是以国民党员资格参加，不是以共产党员资格参加；两党联席会议，是协商决定共同负责，而不是两党公开执行形式，这件事并不含有联合政权的意义（现在参加工作之共产党分子，为图减少政局之纠纷，可以请假）。

（六）工农等民众团体均应受国民党党部之领导与监督，工农等民众运动之要求，应依照国民党大会与中央会议之议决案及政府公布之法令。……

《国共两党关系的决议案》，1927年6月30日

(四) 放弃党对于武装力量的领导权， 反对武装夺取政权

凡是一个革命家万不可誤認革命之手段（武力暴动）为革命之目的（社会組織进化）

《革命与反革命》，1923年1月8日

这个新国家只有在全国群众大革命的狂热中，全国的制度文物思想习惯都受到了革命的洗礼，才能够实现，决不是单靠军事行动可以侥幸得来的，……。单靠军事行动取得政权，这是墨西哥式葡萄牙式的军事投机，决不是法兰西式俄罗斯式的革命事业。

《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1923年12月1日

现在已不是揭竿斩木时代，画符念咒又恐怕不济事，除了乞求帝国主义的援助，我们有何方法能得着和军阀对抗的武器？姑且不說全军阀阶级的军事力量，即以直系而論，想用广州政府现有的军力打倒他，不待军事专家，即稍有常識的人也不应作此奇想。

《国民党的一个根本问题》，1924年10月1日

(九) 武装自卫

(甲) 农民現時要求武装自卫是必要的，但須注意两点：

1. 不要超出自卫的范围（如干涉行政、收繳民团枪械等），是防御的自卫而不是进攻的自卫。

2. 不可有常备的組織，因为有了常备組織，便免不了

因权力关系而时引起与各方面冲突（如地主、民团、駐防軍……等）。

（乙）自卫軍名目可易为自卫团或其他名目，以免引起誤会和嫉視。

《第三次中央执行委员会議決議案》，1926年9月

（七）依照国民党主义，須武装农民，但工农武装队均应服从政府之管理与訓練，武汉現有的武装糾察队，为因避免政局之糾紛或誤会，可以减少或編入軍隊。

（八）工会及工人糾察队不得党部或政府之許可，不得执行司法行动权如捕人审判及巡邏街市等事。

……

（十）童子团执行警察职务，如捕人、干涉行人等事，应严行禁止。

《国共两党关系的決議》，1927年6月30日

附：

布告 为布告事：現在武汉反动派企图挑拨工兵之間感情，制造种种謠言，中伤本会糾察队，以致飞短流长，淆乱外間聞听，影响工兵联合战綫，本会为避免反动派借口武装糾察造謠起見，业于本月二十八日，将糾察队全体解散，所有前領枪弹，并經交存政府，一面仍請政府派兵保护工会，深恐外間不明真象，致滋疑竇，为此布告仰各界人等，一体知照。此布。

湖北总工会 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七日

(五) 鼓吹反动的“二次革命論”， 維護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專政

至于国民革命成功，共产党便要與国民党左派爭政权，这也是不会有的事。共产党取得政权，乃是无产階級革命时代的事，在国民革命时代，不会发生这类問題。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共产党，他們是科学的社会主义者，而不是烏托邦的社会主义者，他們最懂得历史各时代之革命的理論与政策的；他們懂得中国的历史和經濟状况，現在还是国民革命时代，而不是无产階級革命和專政时代，現在不但資產階級需要民主政治，即无产階級亦需要民主政治，或者比資產階級需要民主政治更为迫切；因此，我們敢說，在国民革命的爭斗中，中国共产党是不会有向左超过民主主义的傾向的，或者有时比国民党左派分子一时浪漫的說話还右一点也难說。我們还敢說：即国民革命成功后之建設时期，也必然是革命的、民主的民众政权，而不是无产階級專政，并且还不是工农政府；在那时，革命的民众政权之下，中国的資本主义当然要发展起来，也只有到那时，真正中国的資本主义才能够自由发展。

«我們現在为什么而爭斗？»，1926年9月25日

国民革命成功后，在普通形势之下，自然是資產階級握得政权；但彼时若有特殊的环境，也許有新的变化，工人階級在彼时能获得若干政权，乃視工人階級在革命中的努力至何程度及世界的形势而决定。1917年俄羅斯的革命就是一个好例。俄羅斯各階級各党派的联合革命，本以推倒皇室为共同目标，只以工人階級在1905年之革命及1917年二月革命中

特殊努力，又以当时資本主义的列强因大战而瀕于破产，自救不遑，十月革命遂至发生新的政治組織。但是这种未来的机会我們沒有預計的可能，也並沒有預計的必要，現在只有一心不乱的干国民革命。

同上

无产階級也明明知道此种民主革命的成功誠然是資产階級的胜利，然而幼稚的无产階級目前只有在此胜利之奋斗中才有获得若干自由及扩大自己能力之机会，所以和革命的資产階級合作，也是中国无产階級目前必由之路。

《資产階級的革命与革命的資产階級》，

1923年4月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1927——1937)

一、陈独秀取消主义謬論摘編

(一) 胡說一九二七年革命后中国資產階級对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已經取得了胜利，中国社会已經是所謂資本主义占优势的社会

我們以为：說中国現在还是封建社会和封建势力的統治，把資產階級的反动性及一切反动行为都归到封建，这不但是說夢話，不但是对于資產階級的幻想，簡直是有意的为資產階級当辯護士！其实，在經濟上，中国封建制度之崩潰，土地权归了自由地主与自由农民，政权归了国家，比欧洲任何国家都早。自国际資本主义打破了中国的万里长城，銀行工厂鉄路电綫輪船电灯电话等所有資本主义社会的形式，都应有尽有，已經形成了官僚买办的資本主义。到了欧战前后，更进入了民族的大工业資本时代，商品的生产与消費及貨幣經濟，連穷乡僻壤都达到了，自然經濟已扫蕩殆尽。并且全国一切形式的經濟之最高統治，都在本国的一万五千万万元以上銀行資本依賴外国的五十八万万元以上銀行資本的支配之下，因此資本主义的作用及其特有的矛盾形态，不但占領了城市，而且深入了乡村，乡村主要部分經濟都直

接間接隶属于市場，因此城市經濟絕對的支配了鄉村，因此一切封建残余的政治勢力都不得不力求資本主義化以自存。土地早已是一種個人私有的資本而不是封建的領土，地主已資本家化，城市与乡村所遺留一些封建式的剝削，乃是資本主義襲用旧的剝削方法；至于城市乡村各种落后現象，乃是生产停滯，农村人口过剩，資本主義落后国共有的現象，也并不是封建产物；若因此認為資本主義的經濟关系在中国不占絕對优势地位，則只是常識的判断，而不是科学的觀察。在政治上資產階級經過两次革命，已經掌握政权，社会階級勢力之轉變，更是异常明显。

陈独秀等：《我們的政治意見書》，

1929年12月15日

中国一九二五——二七年之革命，無論如何失敗，無論如何未曾完成其任务，終不失其历史意义，因为它确已开始了中国历史上一大轉變时期；这一轉變时期的特征，便是社会关系之轉變，主要是資產階級得了胜利，在政治上对各階級取得了优越地位，取得了帝国主义的让步与帮助，增加了它的階級力量之比重；封建残余在这一大轉變时期中，受了最后打击，失了統治全中国的中央政权形式，失了和資產階級对立的地位，至少在失去对立地位之过程中，变成残余勢力之残余；它为自存計，勢不得不努力資本主義化，就是說不得不下全力爭取城市工商业的經濟勢力，做它們各个区域内的統治基础。它們所以現在尚能残存，乃因为資產階級受了工农革命勢力的威吓，不但不愿意消灭封建勢力，并且急急向封建勢力妥协，来形成以自己为中心为領導的統治者，并